

道德运气

[英] 伯纳德·威廉斯 著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上海译文出版社

道 德 运 气

[英] 伯纳德·威廉斯 著 徐向东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德运气/(英)伯纳德·威廉斯(Williams, B.)
著;徐向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

书名原文: Moral Luck

ISBN 978-7-5327-4266-0

I. 道… II. ①威…②徐… III. 伦理学-文集
IV. B8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9800号

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图字: 09-2006-677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道德运气

[英]伯纳德·威廉斯 著

徐向东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39,000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册

ISBN 978-7-5327-4266-0/B·262

定价: 2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总 序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存在论转向”和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

范式转变。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古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规范内涵。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向”——如果这种“转向”名符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串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

首先,“语言学转向”对 20 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或陈述的三分法,把价值判断放逐到无意义的领域,而元伦理学则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对价值词汇用法的琐碎研究上,放弃了理性地探讨价值分歧和规范基础的重要使命。50 年代以后的“后实证主义”革命冲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樊篱,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是实践理性转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义倾向以及此后继语言哲学而起的心智哲学研究取向,又引发了在规范问题、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问题上的新一轮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之争。直到 20 世纪末,“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匹兹堡新黑格尔学派内部,是像罗伯特·布兰登(Robert Brandom)那样继续坚持“语言学转向”,承认拥有信念和意愿仅仅是玩一种运用这些词汇的语言游戏,因而哲学的职责只是阐明我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践,而不是根据外在于这些实践的

规范判断这些实践；还是像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那样，在坚持不具有概念结构的东西无法证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坚持非判断的心理事件能够证明信念的合理性，从而得出“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断，否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的结论，这已经成了一场震撼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界并且波及德语学圈的大争论。而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语用学的“真理共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倡导的“语境论”之间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对于民主的规范含义的不同理解：对于真理共识论者来说，民主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识；对于彻底的语境论者来说，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诸如此类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对“语言学转向”究竟要转向何处心存疑虑。

其次，尽管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当代的“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复兴”又有它独特的背景和前提。实际上，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的演变昭示我们，这两种转向之间不但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绵延整个 20 世纪，横跨英美与大陆两大传统(新法兰克福学派中有把实用主义独立出来，与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鼎足而三者)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它不但构成了“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且为后一种转向创造了条件，或者说为更好地阐明自身的规范内涵创造了条件，这尤其表现在滥觞于日常语言哲学并经与美国实用主义互释后产生的所谓“语用学转向”中。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理性转向”之重要一环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勃兴则不但在智识氛围上呼应了心智哲学在 20 世纪晚期哲学中日渐上升的地位，而且从智识效能上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于宣告分析哲学已死，“语言学转向”这一范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更为重要的

是,语言哲学中的(与语言含义相关的)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心智哲学中的(与心智内容相关的)个体主义与反个体主义之争,以及实践哲学中的(与规范辩护相关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这三者之间的纠结和紧张将引领人们重新审视分别由分析学派和现象学派在20世纪初以反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名发起的哲学革命的潜能是否已经消耗殆尽,而这不但关乎自古希腊以来即已奠基的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事业的命运,而且与人类对于自身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上海译文出版社历来重视当代西方哲学重要著作之译译,所创设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更是在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深受读书界的喜爱。“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踵武前贤之事业,尝试以更为主题化同时也更富时代感的方式系统地译介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代表性成果。一方面旨在围绕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集中展示语言分析传统对于价值与规范的理性和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重视把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的著作;另一方面试图较为全面地呈现“实践哲学复兴”中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对古典哲学的根本问题和现代性的根本内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的探讨,还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我们期望并且相信,根据对于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上述理解和把握,按照问题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哲学同仁们艰苦、扎实、细致的工作,本译丛必定能够把中国哲学界和出版界的西学译介工程真正推向深入,促进学术界对于20世纪西方哲学建设性成果的全面总结,并最终为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提

供有益的借鉴和滋养。

本译丛得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支持。

庞学铨 应奇
2007年1月于杭州

译者序

伯纳德·威廉斯与当代道德哲学

1

伯纳德·阿瑟·欧文·威廉斯(Bernard Arthur Owen Williams)被公认为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时报》甚至把他称为“他那个时代最有才华、最重要的英国哲学家”,尤其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哲学伦理学领域中,伯纳德·威廉斯被认为是最有影响的一位人物。^①威廉斯1929年9月21日生于英国西南方艾塞克斯郡(Essex)靠近海边的一个叫做“西崖”(Westcliff)的城镇,他的父亲欧文从事建筑业,他的母亲希尔达是个秘书。他在奇格韦尔(Chigwell)学校完成中学学业。就像英国的很多中学一样,那个学校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语法学校(主要传授语言、历史和文学的学校),但威廉斯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对哲学产生了兴趣——他回忆说:“我们对古代文本做很多语法分析,而那种分析必定已经吸引了我的兴趣。那就是说,当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往往与我的朋友争论那些结果证明就是某种哲学问题的问题。我记得一些问题关系到艺术和道德、美学价值和道德价值、艺术的社会目的。我们有很多争辩,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左,我们对1941年的选举也有政治争论。我们通常争论苏联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那个学校的校长很鼓励他

进行哲学研究,不过,在毕业后,当他进入牛津大学最古老的学院巴利奥(Balloy)学院时,他选择攻读的是古典学(那时被设想为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文学、历史和古代哲学),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牛津或剑桥总是能够拿到奖学金的唯一学科实际上就是古典学。所以我就去了牛津,因为它有一个庞大的哲学系,而我完全可以转学到那个系”。

威廉斯确实选对了地方,因为当时的牛津本来就是哲学的大本营——牛津的哲学统治着英国的哲学,而英国的哲学还继续统治着整个英语世界的哲学;在威廉斯进入牛津学习的那个时期,牛津有50多位哲学家,超过了英国所有职业哲学家数量的四分之一。在那时的牛津,哲学这个学科正处于思想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尽管艾耶尔的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开始衰微,但它对古老的哲学问题的抵制仍然很被看重;维特根斯坦晚期哲学的手稿到处被传抄,并作为保留教材而被使用;J·L·奥斯汀的日常语言哲学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吉尔伯特·赖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是推动语言哲学转向的核心人物,而他在50年代出版的那部反笛卡儿的论著《心的概念》则一直得到了人们的热切讨论;随后,彼特·斯特劳森也开始在哲学舞台上露出了锋芒。威廉斯对他所攻读的学位的历史方面的兴趣因为他对哲学的痴迷而受到了一些损害,不过,结果表明,古典学方面的熏陶在他的一生中都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在哲学方面分心,1951年,他依然以“祝贺性

① 以下对威廉斯生平的介绍主要是根据如下两篇文章:Stuart Jeffries,“The Quest for Truth”,*Guardian Unlimited*, November 30, 2002;和Richard Pearson,“Philosopher Bernard Williams Dies; Weighed Question of Moral Identity”,*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8, 2003。前者是Stuart Jeffries借威廉斯的《真理与真实性》出版之机对他以及他的前妻的一个采访,正文中所引用的一些话语来自这篇文章。

的一等荣誉学位”(congratulatory first-class honors degree, 英国大学体制中最高的奖励)的殊荣毕业。实际上,在他的文科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在场的答辩委员不但没有提出任何疑问,相反倒给了他起立鼓掌的殊荣。在毕业之后不久,威廉斯响应为国家服务一年的号召,去加拿大接受皇家空军的训练,成为一名飞行员,据说他有相当好的飞行技能。在一年的服务期满之后,就在他 22 岁的那一年,他赢得了众灵学院授予他的一份奖学金,成为那个学院的临时研究员,并在那里一直呆到 1954 年。从 1954 年开始,他被正式遴选为新学院的研究员。他的才华早在牛津学习和工作期间就已经展示出来,他的杰出表现使他赢得了“天才”的称号。众灵学院和新学院的哲学家,比如说斯图亚特·汉普舍尔、吉尔伯特·赖尔以及特别是阿尔弗里德·艾耶尔,都很欣赏和佩服他的才华和智识,艾耶尔甚至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来看待,认为他是自己“天然的”继承者。更有甚者,有人还对赖尔说:“在你尚未把你的话完全说出来之前,威廉斯就比你更好地理解了你要说出来的东西,更好地看到对你的话的一切可能异议,更好地看到对那些异议的所有可能回答。”

在牛津读书期间,威廉斯已经结识了一个名叫雪莉·布里顿-卡特林(Shirley Brittain-Catlin)的女孩——政治科学家和哲学家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和小说家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的女儿。他帮助她学习她觉得很头疼的哲学,于是两人就成为互相钦佩的朋友。雪莉后来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伯纳德乘他在皇家空军服役时的休假之机,与雪莉在纽约见面,他们两人访问了新英格兰地区,住在康涅狄格州一位老太太的房子里,那个老太太一直是巴托克的主要赞助者,在战后把这位作曲家从贫困中解救出来。雪莉回忆说,“我记得那个老太太很喜欢伯纳德,因为他对音乐很精通。我们度过了不可思议的一周。那个时候他看起来真的很英俊,当然,皇家空军

的制服也添加了这种效果。那个老太太不停地对我说,‘这就是最奇妙的男人了,你得嫁给他’。”一个星期的奇妙时光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相互欣赏的朋友转变为恋人,尽管雪莉此前不久就有一个近在咫尺的恋人。他们最终在1955年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妇生活在伦敦,雪莉担任《金融时报》的记者,而伯纳德仍然担任牛津新学院的研究员。在1958年至1959年期间,伯纳德接受邀请在加纳大学担任了一年的访问讲师。回国之后,他离开牛津来到伦敦,先是在伦敦大学学院担任讲师,从1964年开始他成为伦敦大学贝德福德学院的哲学教授。他们与作家代理人希拉里·鲁宾斯坦夫妇在肯辛顿(Kensington)合租了一套大房子,在那里生活了17年,在这段时期内,他们有了他们的女儿丽贝卡(现在是一位律师)。

在这个时期里,威廉斯遗弃了“哲学家可能会迅速地使自己变得多余”这个流行的说法,决定潜心研究牛津的日常语言哲学家所忽视的领域。在1962年,他写了一篇题为《平等的观念》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这位工党成员用“其他政策都是不合理的”为论据对一种平等主义的财富分配观点提出论证。在“个人同一性”这个现在变得时髦的哲学问题上,他也开创了先河,把一个年轻人的新鲜观点引入这些传统的问题中。在1967年,即在他38岁的那一年,威廉斯离开伦敦大学,成为剑桥大学奈特布里奇(Knightbridge)哲学讲席教授^①和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在那个时代的道德哲学中,由于受到了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分析的影响,英国哲学家痴迷于元伦理学问题,而对堕胎、饥荒、女性主义这些已经变得很现实的伦理问题毫不关心。在他1971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道德:伦理学导论》中,他对英国道德哲学

^① 在英国和美国,这种冠有名头的教授是由某个人(或某个家族)出钱捐赠或者用某个名人来命名的职位,一般授予被公认为具有重要成就或重大影响的学者。

中的这种倾向发起了一个煽动性的批评。在谈到他的这本书时,他说:“我拒斥这种讨论道德的方式,就好像道德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东西。那种方式是如此令人厌烦、如此无意义!当我写这本书时,它也向我表明,我厌恶功利主义。我曾经有很虔诚的功利主义观点,但我逐渐认识到后果主义的推理只能把你一次次地引向错误的方向。”在那本书结束之际,威廉斯用一种赞成的态度引用了D·H·劳伦斯的观点:“发现你自己的最深冲动,然后遵循它吧。”这句话真的在他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转向中得到了应验:就在这本书出版后不到两年,他应剑桥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写一篇关于功利主义的批判性论文,以便与澳大利亚哲学家斯马特(J. J. C. Smart)的支持功利主义的论文一并出版,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他爱上了别人——该出版社的哲学编辑帕特丽夏·斯金纳(Patricia Skinner),剑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的妻子。大概有两个因素刺激了这个事件的发生。第一个因素是威廉斯的那种自我表达的真实愿望,正如他在回忆中所述:“如果说在我的著作中有一个主题的话,那就是关于真实性(authenticity)和自我表达的主题,那就是这个思想:有一些东西在某种真实的意义上实际上就是你,或者把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表达出来的东西。劳伦斯是我发现我很难理解的一个作者,但他确实用那个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个评论在我作为一个男学生时候起,就与我对与道德价值相对的美学价值的兴趣相伴随,就与我对作为反道德法则的人物的艺术家的兴趣相伴随。”我们待会儿就会看到,在这段话中表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如何贯穿威廉斯对伦理问题的思考的。第二个因素则体现在他与雪莉·威廉斯的关系上——在他们两人之间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正如雪莉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那样:

他就是陷入了爱中，回过头来看，我不得不承认，对他来说，她[帕特丽夏·斯金纳]大概比我更加合适。他需要一个聪明伶俐、有吸引力而又能够支持他的妻子，从我这里他并没有得到这些东西。……我们的婚姻是很有生气的，但是有两件事情使得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紧张。一件事情是我们两人都在我们各自的事业上忙忙碌碌——我们并没有很多时间聚在一起；另一件事情，坦率地说，就是我有失公断，我觉得伯纳德断然拒绝那些他认为很愚蠢的人们的做法不可接受。帕特丽夏在这方面就比我聪明多了。她是不会去过问这种事情的。伯纳德有时候会很痛苦。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人，他不会留下一点情面。他不以为然的那些人对他来说就好像都是死人。法官是不允许别人来判断的。我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但他会说：“那只是华而不实、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在天主教问题上就不断发生争吵。这些争吵让我很痛苦，尽管很长时间以来我不得不学会忘记它。

因此，在个性上的差别大概是导致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作为一位哲学家，伯纳德·威廉斯不得不真实地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不得不真实地面对他所碰到和他所思考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个性是很纯粹的，对真理的探究似乎就是他的惟一使命。然而，事情对于雪莉·威廉斯来说就不同了：早在她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期间，她就开始对从政发生兴趣，并很快就在这个领域如鱼得水。威廉斯离开牛津来到伦敦，其实主要是为了适应他妻子的那种日益攀升的政治雄心。尽管威廉斯把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描述为他的生活中“最幸福”的时期，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不仅在个性上显示出来，而且也在宗教信仰的问题上显示出来——雪莉是一位

虔敬的天主教徒，而伯纳德则是一位无神论者。尽管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但雪莉的政治生涯却使得她经常四处奔波，无法与家庭团聚。当然，雪莉在仕途上节节攀升，先是被选为议会两院的工党成员，然后成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位奠基成员，最终担任过英国国会上议院自由民主党的领袖，并被册封为克罗斯比的女性男爵。于是他们的婚姻就这样破裂了。威廉斯在离婚后于1974年与帕特丽夏·斯金纳结婚，^①但是，在能够再次结婚之前，雪莉却不得不等待天主教堂宣布废止他们的婚姻。在这个等待期间，伯纳德与天主教神学家就婚姻废止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哲学论辩。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时任剑桥大学哲学教授的威廉斯有点儿厌倦教学，想要潜心从事哲学写作。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从1953年到1979年为止，我已经承担了大量可怕的教学任务，我想要说‘已经够了’。那个决定是一种自我探险，是要看看我是否擅长于做实际工作，也意味着我作为一个哲学作者更加自由。我不想变得流行，但那个决定意味着我可以用一种更加自由的精神来写作。”在提出了这个请求后，他在1979年被推举为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的国王学院院长（provost），直到1987年最终离开剑桥大学为止。在他担任院长期间，他与帕特丽夏有了两个男孩——雅可布（现在工作在音乐行业）和乔纳森（现在剑桥大学读本科）。这段时间给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不仅因为他对后来的婚姻感到很满意，而且也因为他有时间广泛

^① 有趣的是，昆廷·斯金纳后来娶了哲学家 Susan James 为妻，作为剑桥大学的哲学讲师，Susan James 同样是一位有成就的哲学家，她的著作包括：《社会说明的内容》（*The Content of Social Expla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激情与行动：17世纪哲学中的情感问题》（*Passion and Action: The Emo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Philoso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以及很多在早期现代哲学和女性主义哲学方面的论文。

地阅读,恢复了他早期对古代哲学和文学的兴趣,并且深化了他对尼采、狄德罗、卢梭和克尔恺郭尔等大陆哲学家的认识。结果,与他的大多数英国同事相比,他的哲学思想就具有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历史敏感性和文学敏感性。他由此而获得的那种更加自由的探究精神首先就显示在《道德运气》这本文集中。

然而,威廉斯最终还是决定要离开英国,主要原因是当时撒切尔政府的保守政策对英国大学造成了重创,尤其是大规模地削减大学经费和教员的工资待遇。威廉斯告诉一家英国报纸说,以他作为一个学界成员的工资,他几乎不可能在伦敦市中心买一栋房子。在2002年11月《卫报》对他的采访中,他这样说道:

我现在很抱歉我的离开是如此公开。那时我相信这里的学术条件确实是个问题,如果我的离开被公开了,这件事情就会让公众注意到这些问题。它确实产生了这种影响,尽管那种做法也使我有气,当我在三年后再次返回英国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很荒谬。我主要是出于个人理由回来的——不同家人一起生活比我原来假设的要艰难得多。

威廉斯确实是为了抗议撒切尔政府的保守政策而决定离开英国的。其实,早在1986年春季学期,他就已经受邀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哲学系的米尔斯讲席(Mills)访问教授。他最终在1986年7月1日正式加入伯克利的哲学系,并在1988年1月1日被任命为1941级梦露·多伊奇(Monroe Deutsch)讲席教授。在1989年春季学期期间,他还担任该校古典系的萨瑟(Sather)讲席教授,并在这个赞助下给出了一系列讲演,后来以《羞耻和必然性》为标题出版。1990年(碰巧是在撒切尔夫人辞职的那一年),想家心切的威廉斯返回英国,并在1991年继任

他以前的导师理查德·黑尔(Richard Hare)成为牛津大学怀特(White)道德哲学讲席教授,直到他1996年从这个职位退休。退休后,众灵学院这个牛津的精英学院再次邀请他成为该学院的研究员。不过,作为伯克利的终身教授,威廉斯仍然继续与它保持联系,经常在那里授课,与他的妻子一道在那里结交了很多密友。2003年6月10日,他在罗马的短期度假期间,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享年74岁。而在他去世前的4年时间里,他一直与多发性骨髓瘤(一种癌症)相抗争,不仅在撰写他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真理与真实性》,而且还计划发表一些关于歌剧的短篇论文,并考虑写一部关于他与政治家的交锋的著作。

威廉斯生前已经出版了9部著作(包括论文集)和大量论文。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伦理学导论》(1972年)已经暗示了他后来的一系列著作所要探究的诸多核心问题,尤其是他对当代道德理论事业的那种质询的态度,他对伦理领域中的“绝对真理”概念的警告,以及他对功利主义和其他道德理论(这些理论按照一种绝对的东西来系统化道德生活和道德经验)的敌意。他的第二本著作《自我问题》(1973年)收集了他在1956年至1972年期间所写的哲学论文,主要探究了一系列与“自我”有关的形而上学问题及其伦理含义。就在这本文集出版的同一年,他与斯马特合写了一本称为《功利主义:支持与反对》的著作,就功利主义的“消极责任”(negative responsibility)学说及其对个人完整性的“摧残”对这个理论发起攻击。在1978年,他出版了《笛卡儿:纯粹研究计划》。这部著作主要是立足于他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访问教授期间开设的笛卡儿知识论的课程。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威廉斯在伦理学领域之外在认识论领域所做出的一项最坚实的工作。不过,对于威廉斯来说,这部著作同样具有深刻的伦理含义,因为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表明:笛卡儿的那种试图从第一人称的观点来为世界的“绝对概